

# 人瑞留芳爱晚亭

李伦新

德艺双馨的话剧和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驾鹤仙逝的噩耗传来,我一时愣怔无语,她的舞台银幕形象,她的音容笑貌,真切而生动地一一映现在我的脑屏幕上,是那般的亲切感人,不!她没有也不会离去,她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我记忆屏幕上映现出这样清晰的情景:那是个酷暑的周日午后,我家还住在南市区西凌家宅的一幢居民楼里,正埋头写作的我忽然听说:张瑞芳同志来了!穿着汗衫短裤的我连忙去换衣,不无慌乱地迎到门口说:瑞芳老师,您怎么来了?她笑盈盈地说:怎么?可以到你家来,不可以到你家来?我连忙说:可以,可以!欢迎,欢迎!我显然多了局促而少了自然,她却大大方方自然地坐到了我的书桌前。

我和瑞芳老师在一起交谈总是无拘无束的,谈市文联的工作,谈电影和话剧艺术,但这次谈得最多的,是如何办好爱晚亭敬老院的事。年逾耄耋的瑞芳老师和她的亲家顾毓青,自己的生活可以说都少有忧虑,但她俩却心系着对同龄人安度晚年的关注,瑞芳老师拿出自己并不丰厚的积蓄和在海外生活的儿子的资助,她的亲家顾毓青老师则卖掉了住房,倾全力办起了爱晚亭敬老院;但如何进一步办好却是个新问题。我和瑞芳老师一致认为:在物质条件进一步完善的同时,如何加强人性化服务和注重精神养老?是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当我送瑞芳老师下楼时,在电梯内和大门口,人们惊喜地欢呼:“李双双!李双双来了!”有的还和瑞芳老师紧紧握手,人们对这位老艺术家的爱戴之情真挚而热烈,这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按照瑞芳老师重视精神养老的要求,我去拜访市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雷群明先生,请求支持,他显然也被爱晚亭敬老院创办者的精神所感动,经与市里的几家出版社商量,都得到了热情支持,分别赠送一批图书的同时,再以成本价出售一些合适的书籍。对此,分别由张瑞芳亲笔签发了致各出版社的感谢信。

爱晚亭敬老院建图书阅览室的消息不胫而走,老人们兴高采烈,有的自告奋勇地来当管理员,有的主动来参与整理图书分类编目,有的报名当志愿者做好服务,包括送书到老人的房间里……

瑞芳老师走进图书阅览室情不自禁地说:“蛮好!像模像样的图书室!”她兴趣盎然地和正在读书的老人说说笑笑,亲如家人。我常去爱晚亭敬老院,有时能听到悠扬的琴声,有时能看到瑞芳老师正和老人们一起在唱歌,唱的是瑞芳老师填词的《爱晚亭敬老院之歌》……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写怀念瑞芳老师的文字时,接到了顾毓青院长打来的电话,我们共同缅怀瑞芳老师,表示一定要继承她的遗愿,将凝聚着她真情关爱的爱晚亭敬老院办好!让她在天国释怀而笑!

笔者熟识的一位长者,从高校退休后,在京开了炸鸡店。不久听说又关了门,原因是朋友太多,重交情要面子的老头子天天请客,难以为继了。据我对他性格的了解,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在我沪上的熟人圈里,也有两位开过饭店,其结局和原因跟北京的那位差不多,用二位的“家婆”的话来说,都是狐朋狗友惹的祸!要我说呢,当了老板就得朋友没错,倒是朋友们对他体恤不够,齐心协力把他吃空了。还有道行深者分析说,开店当然不能忘朋友,但朋友要分类,多请企业、部门有签字权的朋友,不就可以发了嘛!想想也是,做生意的太实心眼赚不到钱!不过实心眼的朋友倒是值得交的,不世故,不势利。只是他们做生意不行,不是那块料。

当了老板如何与朋友相处,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比如开饭店吧,经常请人白吃,那说明你太嫩,不适合干这个。吩咐手下给朋友优惠

吧,有时一个疏忽没办好,严重的能伤了朋友的面子。况且,如果朋友三天两头来呢,让你经常出面打折,朋友不成了叫花子了,脸面往哪搁?聪明点的办法,准备点优惠卡,既给了朋友面子,又控制了人情支出的幅度,只不过少赚点罢了。但是,这样

的惠友之道,常常被纯粹商业化的打折花招鱼目混珠,你给人优惠卡时,说不定人家还以为你满身铜臭呢!于是,做老板的只有辛苦点,来了朋友得自己盯着,灵活掌握,像在钢丝上跳舞,切莫走神,更不能大意。

个体老板的待友之道,虽然有时难免沾上点商业气息,但总的来说,更多地折射出的,还是他一贯的品性和为人。笔者有位不经常碰头但日久便会想起来的朋友,他开了饭店后,新出了什么菜,或遇上什么好事儿,就会来个电话,请我去打打牙祭。他的店坐落在我上下班路过的地方,非常方便,所以一般情况下我总会赴约。偶尔家人聚餐或请客,我就摆在他的店里,也不事先打招呼。结账时,不管朋友在与不在,柜台上从不拒绝,但总是坚持给我打折。不管身在店堂,还是经过那里,我总会感到有种友情的温馨,淡淡地弥散在身心。后来,这位朋友不开饭店了,我们还如从前,过了一段日子,便想起来碰头坐一坐,不管谁请客,不问酒淡茶浓。

有段时间,我经常去另一家精致小巧的路边酒店。它开在环境静幽、梧桐掩映的地方,店堂的布置很文雅、很安静,菜肴也有特色。女主人徐娘半老,相貌平平,但说话绵绵的,很热情。我喜欢那种氛围,与人小聚便经常放到那里。那天,有位朋友拿过我手里的结账单,仔细看了看,瞪着我说:你不是很熟吗,老板娘怎么连白开水都不肯白送?出门时朋友仍在嘀咕,我有些不以为然。但是,内心暗暗觉着这里文雅宜人的氛围,还有老板娘温婉的笑靥,有些捉摸不透了。以后与人吃饭,便去了别的地方。不管怎样,只要账结得明明白白,做老板的即便一钱如命,丝毫不讲情面,也算是“取之有道”的,

等候对方退款时我四下环顾,发现这是闹市区一家很有腔调的饭店,装饰摆设古雅考究,弥漫着浓浓的文化气息。进门处还有个流泉淙淙的水池,开着粉色的莲花。凑近细观,发现那株“清雅高洁”的荷居然是假的,几可乱真。抬头又见高几上的一盆君子兰,蒙着厚厚的灰尘。忽然觉得,这个匠心处处、徒有其表的所在,其实龌龊得不值得光顾。

忻康里所处的曹家渡地区是上海静安、长宁、普陀三个区的交界地。一般来说,凡交界地区因不好管或不去管都比较冷僻、落后和边缘化。但是曹家渡是一个例外。上海有两个“五角场”,那些年,曹家渡“五角场”是比江湾“五角场”是要繁荣多得多的地方。而曹家渡的忻康里更是整个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名气最响的一个居民集居小区。

忻康里的建筑是旧上海最为典型的石库门风格,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建造的。五条横弄堂,二条竖弄堂,加上弯弯曲曲的三条小弄堂,组成了纵横交错,市景有味的小社会。其集中体现在忻康里的三个弄堂口。

第一个弄堂口是在万航渡路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弄堂口的那口“老井”。这口井何时开挖已不可考,应该是比忻康里的诞生更为久远。记得我小时候常常去井边拎水,特别是夏天,用井水拖地板,揩席子,浸西瓜……

第二个弄堂口是在康定路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弄堂口的那个“电话亭”。整个忻康里共有一百多个门牌号,三四千人。这么多人就靠这一个“电话亭”来维系大事,小事,喜事,丧事,好事,恶事,公事,私事……那个年代,凡是电话亭阿姨在弄堂里叫“某某号某某人电话”,被叫者无不屁颠屁颠地一路快跑,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

第三个弄堂口也在康定路上,也就是公交车23路终点站的那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弄堂口摆着那一个个用自来水水管焊接的蔬菜市场使用的

“豆腐架子”。我读小学时的许多课外时间都在那里花掉的,在“豆腐架子”上爬上爬下,在“豆腐架子”旁边玩刮片,顶橄橄核,打玻璃弹子……“文革”时,我年纪太小,父母不让我出去,我就整天整天与一帮弄堂里的同龄人坐在“豆腐架子”上,看游行队伍,看批斗所谓的“牛鬼蛇神”,看进进出出的各种人,聊大大小小的各种事。在这个弄堂口,我白白地浪费了很多青春时光。

忻康里的居住空间是非常局促的,完全是一个“七十二家房客”的真实写照。这老石库门房子的地板和

楼梯都是木质的,走起来嘎嘎作响,其楼梯都是供单人行走的,两者相遇必有一人要谦让。楼梯的扶手经几十年抚摸而变得锃亮发光。家家门对门,窗对窗,张家礼短,李家理长,王家咳嗽,赵家结婚,全弄堂立马都知道。而每家的自来水龙头处和“三角电灯泡”(即23路电车终点站的调头处)的乘凉地是这“七十二家房客”最佳信息传播交流的场所。灶披间阿姨,后客堂爷叔,前客堂阿娘,亭子间小夫妻,前楼外婆,三层阁楼山东老头……今天我包了馄饨,上上下下各分一碗,明天你家蒸了馒头,里里外外各送几只。

现在的忻康里已经荡然无存了。在忻康里的原址上,建起了一个叫“鑫康苑”的居民小区。倒是23路公交车现在还是挂着“忻康里”的标牌行驶在上海的大街闹市区,仿佛在不屈地寻找和呼唤着——忻康里。



皮二从小由外婆带大,都说隔代亲,外公喜烟好酒,见了小外孙,也是唯一的一个第三代,便将自己的嗜好不知不觉传染给了外孙。皮二还在怀胎中,外公用筷子蘸着酒,不时让外孙与他同享。烟,小孩吃了要呛,但外公照样吞云吐雾。皮二自然无师自通了。皮二口才了得,刚谈恋爱时,女朋友要他戒烟,他说:“吸烟有男人之气,如不吸烟,您能在男人中注意到我吗?”确定关系后,皮二又道:“你真的想让我戒烟,我们就早点成家吧。”皮二将戒烟作为求婚之词,在皮二小兄弟中传为“美谈”。结婚后,皮二先是把戒烟时间定在从老婆有怀孕计划开始,后又定在老婆生产之日,一直到皮二的儿子都读中学了,皮二的戒烟计划一直与时俱进地在制订之中。

近来,皮二突闻烟瘾与他有一拼的“插兄”得了肺癌,而他在检查身体时,肺中一片“漆黑”,忽然宣布:要戒烟了。老婆当即给他买来市场新出的“戒烟茶”,并宰杀一只老母鸡以资奖励。不想皮二喝完鸡汤,竟又抽起了香烟。老婆急了。皮二不慌不忙道:“上次买的三条尚余六包总要抽完的。”三日后,老婆看见皮二又买来三条香烟时,感觉“坏”了。皮二振振有词道:“我现在左手抽烟,右手喝茶,这是‘戒烟茶’戒烟和‘戒烟茶’戒烟呀!”

# 我们到哪里去游泳

赵宗斌

六月三十日,本报《社会新闻》版以《野河浜变游泳池,灌木丛成更衣室》为题,报道了位于新江湾城地区的游泳爱好者在天然野河浜里游泳的事实,应该说,报道很客观,很真实,记者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笔者看了想从另一个角度发点议论。人们之所以选择这么一条自然河道游泳,首先是因为可以供我们游泳的场所太少,就拿我们生活的杨浦区来讲,我们年轻时游泳的场馆,比如杨浦游泳池,白洋淀游泳池,白林寺游泳池,三十一游泳池,都因为房地产开发被关闭了。当下一些私营业主办的室内游泳池,门票都要二三十元,有的更高,对于那些养老金两千多元的退休职工来说,无疑是较大的负担。其次,是目前正规泳池的拥挤和管理的不善,卫生状况并不理想,过量的消毒剂、漂白粉,对身体是不利的,前几天就有报道,某泳池因为消毒剂过量,造成九名泳客空气中中毒被送医院抢救的。游泳是一项健康的体育活动,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之一,也应该属于民生问题,人民群众有这样的需求,理应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扶持。我们也知道,对于至今民众的住房还没有完全妥善解决的前提下,重新建设新游泳场馆,无论从资金和水资源来讲,都是一种浪费。但是,对于这样一块大自然赐予的理想的活动场所,有关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可以通过适当的清理,干脆开辟一个天然游泳池来满足民众的需要呢?

出身艺术世家的胡松华、胡宝善兄弟,都是我国歌坛响当当的人物,被京城圈内昵称为“胡大”“胡二”。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文艺新兵,他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和创作中,执著耕耘且建树颇丰。

上世纪60年代初,胡松华已成长为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首席男高音歌唱家。1964年,他有幸入选群星荟萃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阵容,担当第四场“抗日烽火”中男女声二重唱《松花江上》与李光曦分饰A、B角。

就在演出即将如期上演时,剧组组长周总理急切的重要指示:在最后一场“伟大节日”中,为烘托出新中国成立的热烈欢庆气氛,拟增加一首男高音独唱歌曲;还明确要采用蒙古族的音乐风格,并以舞伴歌。

其时,《东方红》剧组的创作团队已解散,许多词曲作家也回到各自的文艺团体。由谁来创作,演唱这首未来的作品,已成为整个演出成功与否的重中之重。时间相当紧迫。胡松华在第一时间得知此情后,便主动请缨担纲此任。胡松华是满族人,在内蒙古大草原有过长时间的下生活和演出的经历。对蒙古族音乐,尤其是长调颇有研究和心得。因此,胡松华对于创作信心满满,旋即进入状态。由于平日生活、经历的积累和对蒙古族音乐的深刻感悟,创作如水到渠成般很快完成。这首名为《赞歌》的新作,以四句无词牧歌风格的长调唱腔开白,进入主题后则运用了4/4拍的短调元素,旋律呈现浓郁的蒙古族风味。歌曲似乎在辽阔无垠的大草原与庄严辉煌的天安

门广场,架起了一道无形的彩虹。《赞歌》成了大歌舞中很大的亮点,广为传唱。

我与海政歌舞团的男中音歌唱家胡宝善交往甚密。他比二哥胡松华小四岁,却是其声乐老师。当年,风华正茂的胡宝善曾留学保加利亚,师从契尔金、勃伦巴诺夫等声乐大师,深得西洋唱法之精髓。胡宝善还是一位创作型的歌唱家,谱写过许多反映、歌唱海军的歌曲。

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金日成首相的访华,周总理要求在京的解放军文艺团体创作几台文艺晚会来招待。于是,三军调集了几乎所有的精英在三座门创作排练。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创作出来的节目几乎全是一副“革命腔”。周总理在审查节目后,意味深长地说:“大海也有平

# 今宵灯谜

胡文明  
短视、近视  
(四字沪语)  
昨日谜面:热土  
(外国地名)  
谜底:埃里温(注:埃,尘土;温,温热)

# 歌坛昆仲

李定国

